



李正华：放下教鞭扛钢枪 为国捐躯父子兵



李正华画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泰山脚下，泰安革命烈士陵园松柏常青，紫薇盛开。陵园北侧，10座大型花岗岩墓一字排开，抗日英雄李正华就长眠于此。

李正华原名李连秀，1905年出生于泰安市漕河涯村(现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漕河村)一个富裕家庭。他自幼性情耿直，富有正义感，勇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李正华悲愤难抑，他自筹经费在村里创办民众小学，免费让贫困学生上学；开办普济中药店，为乡亲治病。其间，他团结了一批热血青年，在群众中播撒革命火种。1937年，李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济南、泰安相继沦陷。国难当头，李正华毅然将苦心经营的民众小学和中药店托付给他人，脱下长衫拿起武器，组织抗日武装，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元旦清晨，李正华、张杰率领50多名游击队员在漕河涯大桥桥头集结，参加东向起义。十几天后，队伍抵达夏张香水寺加入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从此踏上党领导下的武装抗日征程。

加入自卫团后，李正华展现出良好的指挥和战斗才能，指挥和参加了肥城之战、夜袭界首、无梁殿设伏等数十次战斗，极大鼓舞了泰西军民的抗战斗志。自卫团打出了名气，周边各起义队伍纷纷加入。

1941年4月22日，李正华到泰西军分区司令部开会，返程途中夜宿肥城宋家庄村民家中，遭到敌人包围。危急时刻，村民劝他进地洞躲起来。但为了不连累老乡，他断然拒绝，带领通信员向村外冲去，突围至村口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为了纪念这位抗日英雄，泰安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烈士家乡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963年，李正华烈士的遗骸从漕河涯村迁葬入泰安

革命烈士陵园。2020年9月，李正华入选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李正华牺牲后，他的长子李瑞云继承父志参加抗战，1945年10月英勇牺牲，年仅20岁。1951年，村农民协会赠送李正华后人“一门双烈”牌匾。

2021年，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五大队纪念馆在漕河村开馆，如今已成为岱岳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近百批次来此接受红色教育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漕河村党支部书记、纪念馆负责人马晓华说：“李正华在艰苦环境中坚守初心、舍生忘死的事迹，是红色基因的生动展示，他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当代人铭记历史、传承使命。”

漕河村口，当年李正华率领游击队集结的地方，建起了“漕河游击队出发地”石碑和凉亭。凉亭柱子上的对联写道：民族危亡志士挺身行壮举，硝烟散尽英雄业绩励今人。

(据新华社)

梁实秋的幽默人生

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学者、文学家、翻译家梁实秋，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幽默不仅体现在文字中，更渗透到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和为人处世之中。他的幽默不仅仅是让人发笑的艺术，更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智慧和态度。

新婚之夜的梁实秋就幽了一默。他与夫人韩菁清举行婚礼时，婚房选择在韩家，步入洞房之时，梁实秋因为近视且不熟悉环境，竟一头撞在墙上，韩女士将他抱了起来。梁实秋笑她是“举人”(将他“举”起来)，韩女士笑他是“进士”(近视)，然后两人相视大笑。

有一次，校长刘真请一位名人到校演讲，该名人因故迟到。刘校长见会场上的师生都等得不耐烦了，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讲几句话。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又怕伤了校长的面子，只好无奈地走上台，慢吞吞地说道：“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一席话，引得师生们哄堂大笑，现场的不快气氛很快消失。

梁实秋的幽默人生不仅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幽默传递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教会人们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乐观和豁达，同时也告诉我们，幽默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据《联谊报》)

邹韬奋回读者来信

作为《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自1926年接办以来，每天都要花半天时间处理读者来信。从最初的日均40封，到后来的日收千封，来信数量的激增见证着这份刊物与读者日益紧密的联系。他曾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

1932年冬季的一个深夜，在上海福州路生活书店二楼办公室里，一封特殊的来信引起了邹韬奋的注意。信是一位失业青年写来的，字里行间满是绝望：“我是去年八月失业的……在这个被少数特殊人占有的现社会里，我们这样的一群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呵！”邹韬奋立即提笔，这封信，他不仅要回复，还决定刊登在“读者信箱”栏目，让更多人听到民众的呼声。

另一封是一位名叫吴晓晨的青年写来的，诉说着教育与职业不能两全的困境：“因社会经济的衰落，生活程度的提高，子弟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困难……”邹韬奋沉思片刻，开始了长达两三千字的回信。他在信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社会制度根本改造。另一种方式就是先迁就环境，尽可能先入学，入学不成就只有寻业。”

邹韬奋深知每一封来信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着各自的苦衷。正如他所说：“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十多年来，邹韬奋给读者的亲笔回信达4万多封，在编者与读者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让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都能被听见，让每一份苦难都能得到回应。

(据《人民政协报》)

古人如何应对“失业”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唐代诗人李绅的诗句，道尽了古代底层百姓的辛酸。

翻开史书，失去生计、流离失所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农耕社会。天灾、战乱、土地兼并，随便哪一样都能让升斗小民瞬间“下岗”。在缺乏现代社保体系的漫长岁月里，古人面对“失业”困境，真的只能像诗中所写那样“犹饿死”？或是揭竿而起吗？细细探寻，便会发现其中蕴藏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与制度设计。

古代失业，对于不同阶层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而朝廷的应对策略也充满了现实的考量。最常见也最危险的，莫过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失去土地或遭遇灾荒。对他们而言，“失业”几乎等同于“生死存亡”。统治者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一旦出现大量流民，首要之策便是“开仓赈粮”，遍布各地的“义仓”正是为此而设，力求在饿殍出现前稳住局面。光给口粮还不够，更聪明的办法是“以工代赈”。比如北宋名臣范仲淹主政杭州时，恰逢浙东大旱，失业流民遍地。对此，他并未简单地开仓放粮，而是高价收购粮食。这一妙棋，一方面吸引外地粮商蜂拥而至，平抑了粮价；另一方面，高价购粮的财政支出实则转化为灾民的收入来源——参与官府组织的修城、浚河等工程，靠劳动换取报酬，既维持了生计，又建设了地方，避免了单纯救济可能滋生的依赖，成功让流民“回流安居乐业”。再者，对于身强力壮者，朝廷还有一招——“招兵入伍”，将他们吸纳进军队，既解决了其饭碗问题，又消弭了潜在的动乱力量，可谓一举两得。

商贾阶层的“失业”，则充满了风险。他们虽可能富甲一方，但社会地位低下，常是政策调整或朝廷敛财的牺牲品。汉武帝时期推行新经济政策受阻，便将矛头指向商人，没收其财产、课以重税，导致无数商人破产，甚至“连做平民都没资格”。官府极少为他们的“失业”买单，盖因在统治者眼中，商人常被视为“扰乱经济”“与民(农)争利”甚至“勾连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他们的“失业”，往往意味着彻底的倾家荡产，缺乏制度性的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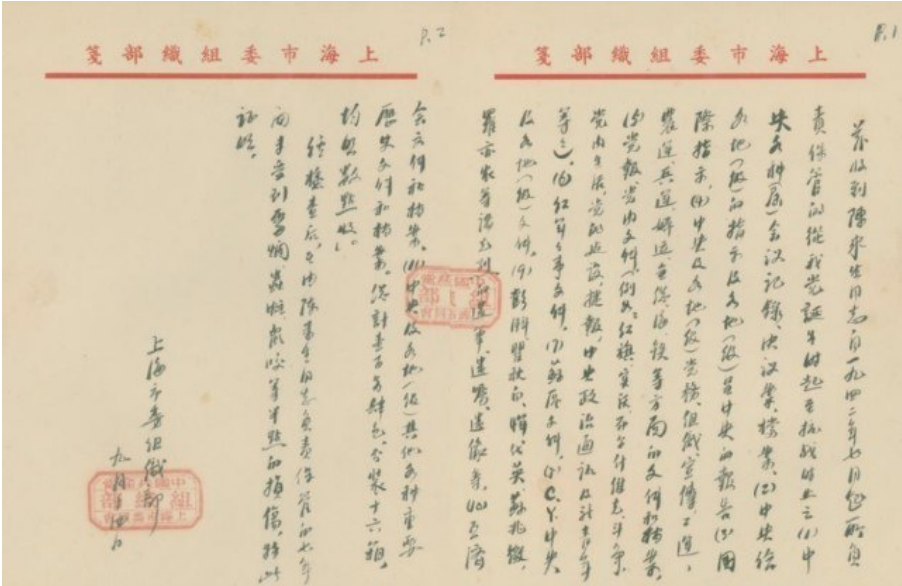
至于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失业”(如罢官、致仕)境遇则优越得多。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即便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庞大的官僚网络、积累的田产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也能编织成一张兜底的安全网，保障其生活无虞。朝廷也乐见其“优游林下”，这是维护整个文官集团向心力的潜在规则。

回望古人应对失业的措施，核心在于于“维稳”与“务实”。朝廷的目光紧盯人数最多、爆发力最强的农民群体，用“赈粮”救急，用“工赈”安民，用“募兵”纾困，手段直接而有效，力求将“失业”的火苗扑灭在燎原之前。对商人则听之任之，甚至有意打压；而对官员则优待周全。虽然这套体系系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却闪烁着重因地制宜、分层应对的治理光芒。

古人的实践，纵然有其时代局限与阶层烙印，但其直面民生疾苦、竭力维持社会运转的努力，仍值得深思与借鉴。

(据《西安晚报》)

中央文库：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陈来生的证明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中央文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上海设立的地下文书档案库，保存了党成立初期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2万余份核心档案。在中央撤离后长达20余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这些档案一直深藏敌伪统治森严的心腹地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最后一任保管者陈来生全部清点装箱，送交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系统留存党的早期历史记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围剿”之下。为了安全，中央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字留痕：文件传阅限制范围，涉密的一般要求阅后销毁，一些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依靠口头传达等。

建党后较长一段时间，由于缺乏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专业的文件管理人员，中央一时无暇关注文件管理事宜，文件一直处于分散状态，自然散存于各级负责人或秘书手中，存放场所常为他们的住所、

秘密联络站或租用的隐藏房屋。

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要求中央“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据此，中央秘书处成立，内设文书、会计和交通三科，文件工作由文书科负责，中央文件进入分散保管与部分集中保管并存的管理阶段。

1927年10月，中央秘书处由武汉迁回上海后，文书科改为文件保管处。1930年4月，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信》中指出：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此后，中央文件大多集中存放在文件保管处。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撤销，中央秘书处的张唯一在法租界恺自迹路(今金陵中路)顺昌里找到一处安全的洋房，将原文件保管处积存的20余箱文件安置其中，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为“中央文库”，也形象地叫作“一号机密”。

党的机关档案规范管理的开端

1931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到秘书处视察工作，发现未经整理的文件与报刊、图书、宣传品混杂堆放，其中不乏机密要件。周恩来随即指示由瞿秋白起草一个文件处理办法。很快，了解苏联文件处置规程的瞿秋白制定出《文件处置办法》。

《文件处置办法》规定了文件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以及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是现今发现的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机关文件管理规定，是党的机关档案规范管理的开端。

《文件处置办法》制定后，周恩来提出重要文件最好保存三套的想法：一套由文件保管处保存，供日常工作利用；一套交共产国际，远程存放；一套本地异地备份存。最终，计划送共产国际保存的设想受形势和条件所限未能实现；异地备份文件也已被销毁。因而，中央文库保存的档案成为唯一系统留存中共中央早期情况的历史记录。

这些档案主要包括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党中央的决议、纲领和宣言；《共产党》《红旗》等党刊；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与我党来往的指示、报告；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等革命先烈的遗嘱、遗墨、遗照等。

接力守护中央文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令党的早期领导人牵挂的这些文件一直藏匿在上海。为了安全，文库曾数易库址，每遇险情，必须搬迁；更换保管者，必定搬家。上海市区有记载的文库旧址先后有十余处，明确承担过文库保管工作的同志有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韩慧如、徐强、李云、吴成方、周天宝、刘钊、缪谷稔、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人，其中陈为人、缪谷稔、郑文道3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间，按照保密规定，党组织只派一名干部与之单线联系，要求其他领

导不问过文库事项，文库工作人员独自居住，减少与外界往来，不参加支部会议，不参与群众进步活动，不发表政治言论，勿使敌人察觉，邻居知晓。组织形式上，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以“家庭化”掩护身份，工作人员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跑单帮的、摆杂货摊的，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

1942年7月，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过守护中央文库的重任，是中央文库历任保管者中年龄最小、守护时间最长的一位。陈来生，今上海南汇人，1919年出生，1938年在慈惠难民所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年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历经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等磨砺，已经成长为具备坚强党性和灵活对敌经验的“老地下党员”。

陈来生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根据保密原则，中央文库除了定期转移，又因知情同志被捕和房东改造住宅等原因数次搬迁。每遇危机，均能在他的周密安排下化险为夷。当时，日伪在上海“强化治安”，街头巷尾布设明岗暗哨，宪兵和警察穿梭巡逻，随时设岗拦下行人搜身，俗称“抄靶子”。在此背景下，为了将中央文库转移到新址，陈来生想出“小鱼钻网眼”的转移办法。他动员全家人参与，分头扮作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每人每次仅携带几份文件，夹在货品中穿行小路和隐蔽弄堂，蚂蚁搬家式地完成迁移。

1949年上海解放，陈来生将中央文库送交上海市委组织部后，华东局办公厅请示中央办公厅如何处理这批档案文献。中共中央办公厅复电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中央秘书处。1950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资料室副主任罗文等同志将中央文库全部档案护送交中共中央秘书处，后人藏中央档案馆。这些档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艰难探索，为科学客观地研究党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据《学习时报》)